

# 軌 迹

谢武稼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轨 迹

谢武稼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轨迹/谢武稼 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1

(长河文丛)

ISBN 7-5039-2783-6

I. 轨… II. 谢…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66669号

## 轨 迹 (长河文丛)

著 者 谢武稼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李彦亮

版式设计 陈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邮码: 1000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印张

印 数 0001-3000册

字 数 11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83-6/I·1263

定 价 1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前 言

2004年6月17日，我把长篇《从零点起跑》和《列车在飞奔》稿件寄给华夏作家网，第二天与夫人张竹君坐飞机去了广州。我们住在小女儿家天河区五山路翰景街翰景轩B座203室。单元房很宽敞，170平米，四室一厅一花园二个卫生间一厨房。翰景轩离华南师大菜场很近，购物方便。翰景轩园林式小区，南国树木花草随处可见，环境幽静，空气新鲜。我开始写“三农”题材的长篇纪实《轨迹》。

写“三农”，倒不是赶时髦，去凑敏感话题的那份热闹。“三农”对于我来说，是挥不去抹不掉的情结。我爸爸10岁当农民，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哥哥13岁下田，屈指数来，刚好60个年头。我呢，也是13岁那年与农民为伍，从那一年算起，也过去了五十六年。1950年冬，我参加了土改，51年入了互助组，这下子我是农民了。52年复了学，以后上中学、读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没有一年跟农村断了缘。这些情况，你能在《轨迹》里读到。

写“三农”，怎么个写法？纪实是定了性的，想象不能用，虚构挂不上号，真实，真实，再真实，特写可谓之。

行文呢，就自由些吧。我告诫自己：写作不设限，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写书的时候，稿子摊在桌子上，啥时想好了一段，就沙沙地落笔。腹稿先行，就不用打草稿了。《轨迹》时间跨度大。半个多世纪，星转月移，世事沧桑，中国的“三农”，处于原生态的混沌之中，陷在农业社会泥潭里拔不出脚杆。人家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奔跑，我们呢，沾沾自喜，不但要救中国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救世界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轨迹》写得较顺利。在广州的70天时间里，我写了14节，约5万字。回到大嵩，我接着写，文思没有中断过。这期间，我是写得慢了一些，花近一年时间，将后半部完稿。《轨迹》终于写成，我如释重负一般轻松。这使我记起了儿时上山砍柴的情景。我要面子，把柴把捆得太大了，担上肩感到重，但我咬着牙，硬是将柴把担回家中。一路上，我听到啧啧称赞声，感到虚荣心的满足。其实，我累得精疲力尽，这一点人们哪里会知道？到了家，柴担放下那一刻，我真的如释重负一般轻松，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写作是辛苦的，它耗去我多少精神和心血。然而我是愉快的。我把写作当事业做，就不觉得苦和累。我视《轨迹》为自己的孩子，对它疼爱有加。我小心谨慎地写，唯恐写歪了。

《轨迹》实在是时代造就的。要不是天（路线）变道（政策）也变，没那块顽石（邓小平理论）去补破损的苍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搞改革开放的话，无论如何也激不起我创作《轨迹》的欲望。欲望被点燃之后，有时候是很疯狂的，天马行空。但我很冷静，头脑没有发热。有人会说，理性和思想对文学创作有害，你又不是在写有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文章。搞文学创作的人就不要有思想了，不要进行理性思考了？太武断了吧。事实是，没有一个优

秀作家是个思想平庸的人。你浑浑噩噩，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轨迹》是一部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中提到的那些人都是真名实姓。我写他们，不是为塑造人物，而是通过他们带出事件和材料。《轨迹》是由事件和材料以及作者对事件和材料进行分析所组成。我为《轨迹》建立了一个坐标平面，纵轴表示时间，横轴表示地域，从而形成《轨迹》的时空，或叫作“三农”时空。纵向时间嘛，从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田地到今天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规划，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时半个多世纪。横向地域嘛，主要以鄞州农村为蓝本，以湖南道县仙子脚农村、北京郊区、福建南平、中部6省农村为副本，剖析“三农”问题。至于书中写的关于美国阿米什人的生活，那是插笔，让读者换换阅读口味。读者通读《轨迹》之后，你就会明白，“三农”时空曲率（变化程度）受一股引力影响，那引力就是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现在我们都为“示范村”树形象，如众所周知的浙江奉化藤头村、萧山民航村，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这些村实施“外圆内方”政策。所谓外圆，即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内方呢，莫不是搞计划经济那一套？我的理解是，示范村切忌设置太多的抑制人的自由发展的清规戒律。控制农民到头来是控制不了的。美国的阿米什人，如今就有10%左右的年轻人选择了外面世界的生活。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错，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你说呢？

作者自信，《轨迹》开合自如，跌宕起伏，可读性强，让你感到亲切，让你明白事理，让你思考问题，懂与不懂，都会有所收获。

2005.7.31 写于大嵩

1937年6月2日凌晨5时，宁波新江桥附近的一户小康之家年仅26岁的女主人谢卢氏，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那就是你。母亲这样对我说。母亲说这番话是当我要去北京读大学动身前的那个晚上。那时乡下没有电灯，我家点的是美孚灯。我望着灯罩不敢看母亲忧伤的脸。她抱怨我什么地方不好读大学，偏要去这么远的北京，杭州、上海就不好吗？我无言以对。我填了杭州、上海等地的高校志愿，选的是中文专业，因为我爱好文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我，我并不高兴，还不知道去学啥专业，录取单上的备注栏里写着，专业待到校后看布告。我有所预感，我填报的法语系志愿肯定是落空了。果然，我被分配到俄语系去了。这是后话。现在我面对的是有病的年迈的母亲。该如何安慰她呢？对不起，孩儿不是故意的，阿姆。母亲抬起头，看看我，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贤康，阿姆刚才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去北京上大学，阿姆心里哪会不高兴，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也让人说对了，你一生下来，都说你长得俊俏，脑门飘着一朵祥云，说你长大了，准会读书，这不，你中了状元了呢。

说我中了状元，我阿爸、我哥和妹妹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虽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时代已进入到1959年夏天，人民公社成立也过去了一个年头，人们脑海里还残留着旧思想旧观念。我是瞻岐公社第一个大学生，且出身于贫农家庭，为阶级争了光；乡亲们教育他们的孩子，要以我为榜样，勤奋地读书，也做个大学生——红色接班人。

在那个年代，评价一个人，首先看他的阶级出身。你的祖先越是穷得里光外滑，像个“红毛”瓶，说明受过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越深重，你就是革命的种子，党的依靠对象。亲不亲，阶级亲嘛。我很想知道家史。奶奶在病榻上告诉了我。我祖父给一家地主做长年，娶了我奶奶，是离瞻岐三五里远的西岙村人杨氏。杨家也是世代雇工。我母亲的娘家（在大嵩乡岐化村）四个侄子都是给大户人家做长年。还有，父亲的几个本家也是雇工。所以，我家的社会关系不管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是受雇于他人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不拥有劳动的对象——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奶奶说，最苦的是自家没有房子，得租屋住。东头住一年，西头住一年，不时地搬家，吃尽了苦头。我家的根在瞻岐南二村拾房，因老是在外流浪，久而久之，拾房族里的人都快把我们给忘了。奶奶一生的理想是在拾房拥有一间私宅，这样就能做个正宗的拾房人了。她这样做着梦。有一年，我祖父暴病身亡，当时他还只三十来岁，我父亲刚好十岁。祖母负债处理完丧事，挽亲谋眷托人，有家地主答应我父亲做他家的牧童，白吃饭，没有工钿。祖母是个很能干的女人，针线活儿没的说。她独身一人来到宁波，终于在盛公馆找到了安身之处。盛家老太太见我祖母人长得清清爽爽，凡是针线活都拿得起，于是把祖母留在她房里做贴身佣人。祖母对老太太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周周到到，深得老太太欢心。第二年盛老太太做七十大寿，祖母把一切应酬之事安排得妥妥贴贴，老太太心里在想的要做的事，祖母都早为她办妥了。老太太愈发欢喜祖母了。寿席过后，老太太问我祖母，里山是不是有个十一岁的儿子？祖母说，是的，边回答边掉眼泪。老太太向祖母提了出来，叫我父亲到一家菜馆（盛家开的）去当学徒怎么样？祖母听了连连说谢谢老太太，谢谢老太太。就这样，父亲辞别了东家到宁波开始他的新的



生活。

父亲由学徒做到伙计，积了一笔钱，到23岁头上，娶了我16岁的母亲。母亲长得很清秀，与奶奶一样会女红。经奶奶介绍，在盛公馆做细活。这样，一家三口人都挣钱，家境渐渐好了起来。父亲的厨师手艺学得较精，再说在宁波工作了近二十年，人头混熟了，他30岁那年，自个儿当老板，开了宝兴钱庄包饭作坊。从此奶奶和母亲不在盛公馆帮佣了。父亲在拾房买了间楼屋，可把奶奶高兴的不得了。她日夜念叨着要回老家去住。父亲拗不过她，也只好答应了。好在奶奶身子骨还硬朗，生活自理不成问题。奶奶到了乡下，吃素念经拜佛，观音阁是她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好多老婆婆在，自然不感到寂寞，父亲和母亲也就放心了。母亲婚后七年来一直没生养，也不知是啥原因。可也怪了，开了包饭作坊做了老板娘，第二年就怀上了我哥哥。奶奶邀了功去，说是她求拜观音菩萨才让母亲得的子。四年后，母亲怀上了我。办过满月酒没几天，日本飞机把一颗炸弹扔到老江桥上，炸出了个大窟窿，怪吓人的。宁波城里市民恐慌万分。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去家乡躲避一下？父亲说，再瞧一阵子看。奶奶得知了这一情况，乘鄞横公路汽车上了宁波。她对父亲说，叶落总是要归根的，不如乘这一次机会，全家老小搬到瞻岐去，我们家世代农民，土地是我们命根子，到了瞻岐，买下些田地，不愁日子过不好。父亲有些犹豫。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已习惯于宁波的生活，对农村农民农业已很陌生，想起来是很遥远的事情。再说他虽放过一二年牛，可农活他一点儿不会。开饭馆轻车熟路，收入不薄，丢下那饭碗父亲实在舍不得。奶奶发火了，骂我父亲轻重不分，赚钱事小，全家人的安全事大。父亲没办法了，只得听奶奶的。说句掏心窝子话，父亲能做小老板，全靠奶奶，奶奶的话哪有不听之理。于是父亲把包饭作坊以

低价盘给了他人。就这样一家人（五岁的哥哥由奶奶领着，我呢，由母亲抱在怀里）大迁移了。父亲租了一辆大汽车，车上装着家当，司机谨慎地开着车，一路颠簸。读者想象得到，那时公路的质量哪有现在的好，泥沙铺就的经雨水一冲刷，露出东一个坑西一个洼来（写到这儿，允许作者插上一笔：后来沿路的老百姓为阻止日本兵入侵，纷纷拿起锄头铁锹把鄞横公路破坏掉，可以说是乱挖乱掘，成千疮百孔模样了。从那时起鄞横公路一直没有修复，直到我大学毕业1964年才通车）。你父亲和母亲脸上没有笑容。奶奶这样对我说。我心里明白，是我逼他们返回老家去，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汽车开到独山就止了（现在的终点站是横山码头）。从车上卸下东西，雇了十来个挑夫担到瞻岐去，二十里地呢。

我们家在拾房安顿了下来。9岁之前家境的变化我是一点儿没印象，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全由父亲和母亲在我上了中学之后说给我听的。

贤康，你听好了，我家捞了个贫农阶级成分，那是天意，怎么会是天意呢？老天安排的嘛。

那时我们家很有钱，买下几十亩土地绰绰有余。奶奶有那打算。父亲考虑的是，待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去之后，他还要上宁波开包饭作坊。所以置下的几十亩土地性质属活业，允许卖方以后有了钱可以赎回去。亲戚们知道我家买下活业田后尚有余钱，都来借钱，父亲是苦出身，尝过贫困生活的滋味，没让他们空着手回去，一个个给了钱。父亲说，钱借出去没想过来还。奶奶要在西山（现瞻岐镇中心小学后面那座山）买个墓地和置一口楠木棺材，父亲都一一照办了，以尽孝心。

头几年，家里收入蛮不错的。父亲回忆说。活业田自个种不完，

给别人种收租佃。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时局的动荡，通货一天天膨胀，金圆券大幅度贬值。上个月能买一头牛的钱，这个月只能买一只羊了。到了后来，你过三条街，物价就能跳三跳。不幸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些典押活业田的户主拿着一叠贬值的金圆券来取田。父亲惊呆了，嗫嚅道，那怎么行呀，当时一亩田的抵押款值多少，能买20多担谷子，今天买一斗米也不够了。他们笑着说，那也没有办法，货币贬值只能怪国家，自认倒霉吧。我家就这样破产了。痛苦是不用说的了，我母亲伤心地哭过好几回。奶奶怨恨父亲不听她的话，要是买的是永久田，就不会有那档子事了。父亲本不相信命，这一回也认命了。不是吗，我家由穷变富，又由富变穷，老天爷不让我家富，是厚爱我家。要是不避难到瞻岐，在宁波把包饭作坊开下去，父亲就成为小业主，一个准资本家。要是物价不暴涨，金圆券保值，我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了。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属于剥削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现在倒好了，我家在土改中划了贫农成分，成了党在农村革命的依靠力量，实在是因祸得福。

## 二

父亲现在是佃农了。为养家糊口，向南二村的兴大房租了茶亭畈的二亩良田，租谷每亩二百斤。兴大房是地主，奶奶与当家的还有点儿沾亲带故。有了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年关时，地主家祭祀列祖列宗，父亲常过去帮厨，才把田租给我家种。我一直闹不明白，穷人家出身的奶奶，怎与地主家攀上了亲戚？直到土地改革穷人吐苦水时，

我知道了爷爷是兴大房的长年。单靠租种二亩田是不够的，父亲犯愁了。就在这时，奶奶告诉父亲，她私下里买了五个户头的会田股。会田有五亩，是横河墩的良田，每五年轮到一次。拥有所有权那年，业主只需七月半请高僧在岐山书院放一次焰口，算是敬祖。父亲接过奶奶手里的入会凭证，真不知要如何谢谢奶奶。说到会田，我想再插上一笔。瞻岐那地方，除了会田，还有一种属于祀田的所有制形式。所谓祀田，是同宗的子民共同拥有的产业，所属的业主少的三四户，多的七八户。田亩有多有少，一般二三亩，多的五六亩。大家轮流着种植。轮到的户主，当年要在清明那天办一桌小菜丰盛的酒席请业主们吃。老祖宗真聪明，他们想用这种形式的产权制阻止土地高度兼并，以避免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我家的祀田也有一宗，不过亩分小，才二亩五，而且是六年轮到一次。

父亲种田，六十岁学跌打，农活掌握得半生不熟。耕田不会，要请人，自家没有耕牛，得租人家的，这样，每亩田的耕耙费就很高了：牛耕谷 16 斤，请人耕田工钿 10 斤，一并 26 斤。父亲拔秧插秧也不很利索，因拔秧插秧是潮水活儿，慢腾腾会错过季节，父亲又得请帮工。唉，种田要幼年出家。父亲不止一次感叹道。幸好，我们在瞻岐安家的时候，父亲置了些办酒所需的碗筷盆子汤匙，谁家婚丧之事了就来贯，父亲又是个好刀手，随人去掌厨，藉此家里增加了一笔收入，生活能勉强维持下去。

父亲没有帮手，母亲缠过脚，下不了田，只能晒晒谷，农活全由父亲一个人顶着。对于父亲的辛劳，年幼的我难以体会。

9岁那年夏天我读完了一年级，长我4岁的哥哥初小毕业。我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第1名，哥哥是第3名，兄弟俩都拿着奖品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父母见了也高兴自不用说。没过一会儿工夫，父母

告诉哥哥，下半年不让他接读高小，帮家里种田。哥哥对父母的决定很感惊讶，一时忍不住，竟嚎啕大哭起来。面对哥哥的伤心之极，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在一旁陪着他流泪。母亲也哭了。她抚摸着哥哥因伤心痛哭而颤动的肩膀说，圣康，娘对不起你，让你停学，娘知道你会念书，可是没办法呀，你爹已四十六七岁了，体力一天天差了下去，农活要人接呀。13岁的哥哥听了母亲的话就止住了哭，但还是含着泪说，娘，我去做农民，弟弟的书要读下去。父母自然答应了。

在我也到13岁读完高小第一年的那个夏天，即1949年人民解放军要去解放舟山，有一队兵上千人马驻扎在瞻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搞文娱宣传的女兵，她们年纪都很轻，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来美妙动听。后听大人们说，她们都是学堂生，在中学里读过书。

“中学”二字跳入我的耳朵里，我第一次知道，读完高小还有读中学的。读了中学后要干吗呢？参军呗，跟那些女兵一样。我日后能读中学吗？我问自己。知道了。我赶忙打住，不让想象的翅膀在天空飞翔。

还想读中学，连高小也没念完呢。当1949年秋天我失学在家，就这样悲叹自己的命运。我忽而觉得，做个瞻岐人命命中注定当农民。哥哥已经做了4年农民，他有何感想？我没问过他，其实兄弟俩之间也无从进行思想交流。

但是呢，我失学在家，也没去做啥农活。当母亲去溪坑洗衣服时，我就照看小我10岁的妹妹。母亲洗衣服回来，我解放了，就奔出家与我同龄的也不在念书的小伙伴们玩儿去了。小孩子生性好动。我们爬到一棵高高大大的树上去从鸟窝里取出鸟蛋，看谁取得多。在外觅食了一天的飞鸟回到家不见卵蛋，蹲在鸟窝边一声声凄厉地

哀鸣，抱怨人们太残忍，劫走了它的孩子。“十月怀胎”容易吗？鸟儿用血和泪在控诉，可当时的我们野蛮成性，哪有现时的“人类与动物应和谐地相处”的环保意识？到山上去采摘野果，疯了似的漫山遍野地跑，为抢吃一种叫“黑饭”的野果子生生把手和嘴唇染成了紫色。我们还跑到中保庙（为纪念抗倭英雄裴将军，江浙沿海一带有这样的裴将军庙 18 座，号称沿海 18 裴）去，但不是去瞻仰裴将军，对泥塑木雕的菩萨理解不了，倒是赌博发生了兴趣。赌博那玩艺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管对大人还是对儿童而言，当今世界上的赌博现象很普遍。柬埔寨、澳门和美国开设了国家政策允许的赌场。越南在和我国接壤的边境有地下赌场，怎么也禁止不了。越南政府起先听之任之，最后由非法转入合法，堂而皇之营业，说是给国家增加了一笔财政收入。我们国家从政策上和理念上一直对赌博一票否决。但凡夫俗子就是恶习不改，视赌博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举国上下打麻将成风，各地的派出所也懒得去管它了。2003 年春节，我去广东陆丰农村我小女婿老家住了几天，在那里看到了一幅画面：大年初一祠堂里做戏文，演的是潮剧。一个手执长矛，裤脚卷得老高，脸上表情肃穆不知叫啥神明的角色随着脚杆跳一次，口里白一句或唱一句。台下竟然没有一个观众。我很纳闷，那是为何？后来才知道，戏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祖宗看。台下一片冷清，但戏台一侧的泥地上可热闹极了。三五人一堆在赌博。参赌的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个个衣衫不整，手都脏兮兮，套一句俚语，属于下里巴人。他们玩的是什么赌术，我看不懂。只见不停地洗牌、下注、摊牌，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纸币庄家吃进赔出忙个不停。我们那时赌铜钿、铜板，玩的是牌九、罗宋、沙蟹、骰子。赢了高兴，吃饭格外香甜；输了心里难受，连晚上睡觉也不

踏实。现在回想起来，庆幸后来复了学，念完高小，接着读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不然的话，我会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

收割晚稻的季节到了。母亲要晒谷，照看妹妹的任务全落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很沮丧。母亲见我心情不好，问我道，是不是不想带妹妹？是，我如实地说了。娘忙不过来，咋办呢？母亲一点儿不生气，柔声柔气地问我。我也犯难了，咋办呢？我在心里问自己。忽而我脑海里冒出个主意来了，它让我兴奋异常。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经常发生。念书的时候，我面对一道较难的算术应用题，被卡住了壳，不是遇难而退，而是勇往直前，捧着头日攻关夜攻关，非把题目解出来不可。当式子列了出来，我好兴奋呵。这一次虽不是解难题，没啥苦思冥想，伤了很多脑细胞，但着实也让我费了不少心思。我对母亲说，娘，家里雇个女帮工吧，工钿由孩儿捡来的稻穗抵。母亲看看我，说，好吧。谢谢娘。我向母亲鞠了个躬，跑出家去告诉小伙伴们娘答应我拾稻穗了。

### 三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拾稻穗。

早晨，太阳从海那边升了起来。我吃过早饭，带着干粮，肩背竹篓子，腰上系了条布兜，和小伙伴们一共四五个人出发了，向田野走去。

瞻岐是个大集镇，由四个村子组成。南二村约三百多户人家，东一、东二村大了些，各四百多户，三个村子都属谢姓，异姓找不出十

来户。南一村跟南二村户数差不多，但属周姓，异姓户也很少。全镇一千四五百户人家，七八千人口傍山聚居着。由癞头山、连坑发源的二条溪水涓涓淙淙流下来，到慧日庵前面的仙人眠床岩下汇成一条大溪，直奔新里桥下，然后入河。从这儿开始，就是瞻岐田畈。一眼望出去，田野广阔无边，足有一万五六千亩土地，还不包括供晒盐的盐地呢。那条河叫什么来着，后塘河？对，后塘河。但各个地段有不同的叫法。我记起来了，有叫横河、狗河、洪河的。流经十几华里后，到了万春塘，河水由磙门溢出入东海。

瞻岐，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世界也就是瞻岐，在我读中学之前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对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概念一直是破碎的、不完整的，即使我读完了大学之后参加了工作直到退休。当我阅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才对“三农”问题有所思考。我的一生（虽在北京念了五年大学，即使在这期间，每学年也有二次，每次近一个月时间，下农村劳动）没有离开过农村，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萌发写《轨迹——关于“三农”话题》的初衷。本来我要写一部反映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的长篇，现在暂停。

从村子到新里桥头有二里地。我们来到新里桥，站在桥头望，看到近处的田畈上农夫（小学国文课本这么称呼）们有的弯着腰割稻，有的提着稻把往稻桶边上甩——打谷。我们向后塘河左岸正在收割的田块走去。

我们到了横河墩。这里是近千亩的良田畈，号称瞻岐平原上的粮仓。我家拥有五亩会田，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了。不过今年还没轮到我家种，明年才能轮到。

我们在一块收割完毕的稻田上捡了起来。捡稻穗对我来说，感



到挺新鲜。当时我就想，我是要做一名农夫的，与我哥哥一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不然日本飞机怎么早不炸晚不炸宁波老江桥，偏偏要在为我办过满月酒之后几天呢？但是呀，哥哥当农夫也是从拾稻穗开始？他没有跟我说过，我想不会吧，一定是直接下田干活。这时候，我听到小伙伴们在说：贤康，你瞧，田里的稻穗好多啊！真的不少哩，都是些断穗。它们成熟较早，待收割时，茎已枯了，一碰穗与茎分离，就掉到田里，收割的人虽也看见，但哪有工夫一穗一穗地去捡，好了我们拾稻穗的孩童。

一天下来，我能捡5斤左右的稻谷，刚好能支付一个帮佣的工钿。我记得一连拾了十几天稻穗，到最后渐渐生厌。母亲看了出来，说道，终究不是当农民的料，有机会去学木匠活。做个木匠我行吗？我问自己。我答不上来。于是去问小伙伴们，叫他们说说看，可是没有一个赞同的。他们说，学手艺很苦的，师傅对学徒可凶哩，师母娘还分派你干脏活累活，要你倒尿罐，抱小孩，烧火扫地洗碗筷，没准一天让你只睡上几个小时觉，那不是活受罪？还是做农民吧，虽说也苦，弄口饭吃吃，但人身是自由的。“人身自由”四个字是现在的我替他们表达出来的。不但当时的小孩明白不了“人身自由”的真正含义，今天的大人们能明白吗？中国的农民，解放后当家作主人，但受身份制和户籍制的双重束缚，“人身自由”了吗？

在拾稻穗的那些日子里，让我看到了一个社会现象，即倒稻桶谷的行里人。

所谓行里人那是瞻岐老百姓的一种叫法。别的农村有没有行里人和对他们这种叫法笔者没有考察过，不得而知了。后来我才知道，所谓行里人是满清八旗子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八旗兵沦落为行里人。他们住在庙堂，女的成为送娘（新娘子）婆，男的倒稻